

张 治

随笔

钱锺书早年学文章的“兔园册”

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迨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解解会，而乔作嬉笑；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

钱锺书晚年补订《谈艺录》时，曾提到上面这段少年读书经历里的往事。我们知道了到1927年，他原本就读的苏州桃坞中学暂时停办了，他随即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因此，上述这段经历，就发生在1926年夏天。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细数了夫君儿时种种“痴气”的表现：他小时候的读书、识字、写文章，都因他受“没出息”的大伯纵容而养成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的脾性，毫无章法，全凭兴趣。早年书摊上租小说囫圇吞枣地看下来，固执地自作主张读错别字，滚瓜烂熟地记得关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两却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在正统的诗文修养的教育上，还有尚待引导激励之处。在杨绛的记述里，上述这场考校文章的功课，具有更多人困窘的细节：

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頓……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文，嵌些骈偶，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将这两段记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他作古文的人门书就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嵌些骈偶文句是因为读了李兆洛编选的《骈体文钞》，而自学作诗，首先是依赖于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

骈体文以骈偶对仗为句式特征，重藻饰与用事。历来论者可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以骈体文为纯粹的骈文，即通篇皆骈者，于是排斥散文句式的混入，有意与散文（即唐宋之古文）分庭抗礼；另一派则以为骈体文可以骈偶为主，结合散文句式的优长，强调骈散会通。这两派在清代可分别以阮元和李兆洛为代表。阮元是《四六丛话》作者孙梅的门生，并受力诋唐宋古文的凌廷堪之影响，后来写作《文言说》，标榜“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将单行的散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李兆洛服膺姚鼐的古文成就，但不满桐城义法所谓刻意地无所依傍、不求工

整，认为“奇偶不能相离”才是天地之道。三十一卷本《骈体文钞》即多选骈中有散、散中有骈的文章，并声称“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人不可”（《答庄卿珊》）。

民国时期，就骈体文学发表研究观点的学者，尚有刘师培、李详、孙德谦、钱基博、刘麟生等人。其中李、孙、钱等人皆主张骈散合一的观点，尤其孙德谦《六朝丽指》声称“骈散合一乃正格”。影响最大，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拈出孙氏“骈文尤贵疏逸”的观念，总结为“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因此，杨绛回忆说钱锺书学习古文并不遵守桐城义法，时而加入骈偶句式，他父亲反而会赞许。钱锺书后来在《谈艺录》提到龚自珍《常州高材篇》，将之视为“常州学派总序”，首先肯定的就是阳湖派古文的“文体不甚宗韩欧”。单纯地排斥一端，独尊骈体或散体，在钱锺书看来都是“一叶障目”的成见。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以秦李斯石刻铭文（又收入李斯《上秦王书》）为首，后面收录的都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章。钱锺书后来的读书笔记里以及著作里都再也没提到过李兆洛这部书，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钱锺书对于《昭明文选》的态度。

我们不妨以清人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一里的话来作为一个对照：

初，稚农游金陵，昵一妓，欲挟之归。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观君谈论间，恨读书尚少耳，他日请相从也。”……假东湖僧舍以居，夜读《昭明文选》。一沙弥前曰：“秀才年不为少矣，乃尚读此‘兔园册’耶？”稚农益以为耻，发愤肆力于经史之学，遂为通儒。

“稚农”指的是《甲申传信录》作者钱士馨的字，这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浙江平湖县人。据说他韶华之年好冶游，后发愤治学。可见明清时的人已经把《文选》这样的书当作童蒙应试所用的“兔园册子”了。因此，开始藉以寻觅门径的初级选本，在后来不断奋进突破的过程中也许会失去价值。尤其是“文选学”在清代经阮元专门提倡，盛况一直不减，“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惟《选》学’与《红》学’耳”。钱锺书素来反感“朝市之显学”，因而也很少从正面提到《文选》一书。

《谈艺录》《管锥编》都曾站在《东坡志林》的角度，“推崇魏晋之文章，而恨《文选》之未尽”，乃是“齐梁小儿不解

事”。昭明太子不懂陶渊明《闲情赋》、王羲之《兰亭序》的好，是时代风气使然，后世讥诮其为“文人之腐者”，“笨伯”的大有人在。钱锺书不追风，反倒说几句公道话，他不满《文选》的是删略或漏掉另外许多佳作，虽收“书”体，却排斥所谓“直说不文”的“家书”，比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及北齐人写的《为阎姬与子字文护书》，等等。钱锺书译贺拉斯《诗艺》里的话：“石不能割而可以砺刀，不能诗者评诗，正复如此”，——在他心中不能文者评文、编“文选”，亦复如是。

《骈体文钞》所录文章，大多也是极为精彩的。但假如我们翻阅钱锺书后来的已刊著作，就会发现在他个人的阅读史里，早已摆脱了少年时代那部“兔园册子”在格局、视野上的影响，对于很多篇章持有异议。比如班固的《高祖酒水亭碑铭》，钱锺书熟读洪迈《容斋随笔》，晚年引用《三笔》卷九所指斥此篇是后来“好事者”伪作的判断。北魏魏鹏举（子升）最有名的文章《寒陵山寺碑》，李兆洛选此篇的目的在于“其为唐初等慈、昭仁诸文嚆矢”。但后人所见，都是据《艺文类聚》卷七十七摘录。钱锺书指出《类聚》引文首有“序曰”二字，铭词已略，且序文也好像经过了删节：

《朝野金载》卷六记庾信论北方文章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正指此碑；据现存面目，已失本来，庾之特赏，只成过誉耳。

至于那些哀策诏书，一律不能引起钱锺书的兴趣，他对模仿“九锡文”一体的俳谐游戏之作倒是更关注一些。

东汉陈忠的《荐周兴疏》，谭献评语是“似未完”三个字。钱锺书对此心细眼明，《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三二”说：

按同卷忠《奏选尚书郎》实即此《疏》末节，不应重出。

不仅校正了严可均的错误，同时也等于是给少年时代的读物做了一个注脚。

还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三百十六则已引晚清学者赵桐孙《琴鹤山房遗稿》卷五《书文选后》这段话：

《文选》有贗作三：李陵《答苏武书》、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按之于史并不合。此《檄》为曹公作甚多讹谬。以荀彧之名告江东将校，而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荀攸死于十九年，而《檄》中群臣斥服、张鲁还降、夏侯渊拜征西将军，皆二十年、二十一年时事。

《管锥编》里收入这则札记，补上一句“足补《选》学之遗”，已经是否认这篇文章

的作者归属，由此不认可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了。阮瑀那篇也在李兆洛选目之列。

还有一篇题为“魏伯起为东魏檄梁文”，认为出自《魏书》撰者魏收手笔，李兆洛批注说：“此据《文苑英华》录《北史》慕容绍宗檄梁文，其词与此相出入”，《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就认为是魏收所撰。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卷五杜弼《檄梁文》，此文即其“后篇”（“前篇”又重见于《全后魏书》卷五十四，作者定为慕容绍宗）。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有一大段讨论，其中同意严可均的意见，认为作者就是杜弼，“前篇”收入到《魏书》，是经过魏收润色的；并认为“前篇”较“后篇”更佳胜。这段讨论在文句的艺术品鉴赏上非常细致，但是也许疏忽了时代背景的考察，曹道衡先生在《北朝文学六考》一文中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无论如何，至少钱锺书在此表达了对少年时深受影响的人门权威读本的一种质疑。

还有像卷十九收入的《与嵇茂齐书》、《文选》李善注根据干宝《晋纪》认为作者是吕安，李兆洛遵从此说。但《嵇绍集》分明说是赵至所撰，严可均持此说，钱锺书在札记和著作里每次提到此篇都以赵至为作者。

在十六岁这年同时从《骈体文钞》和《古文辞类纂》两书入手，自然使得出身常州的钱锺书并不单纯推崇骈文，对于阳湖与桐城两派能做较为客观的认知。例如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这篇骈文，固然文辞佳美，历来传颂，什么“珠角擅奇，山庭表德；仪范清冷，风神轩举”，“千秋万古，英灵在斯”，都是名句。但钱锺书不满其情感上不够真挚，放在庾信的别集里面看这些类似的作品，尤其发现很多问题，行文最忌讳的就是不贴合，骈文以连类丰赡为美，不贴合造成了事理上的牵强。他认为能够在墓志碑铭文章上有所改变，破除旧格式而“出奇变样”的，乃是韩愈，此后还有王安石和欧阳修，而姚鼐《古文辞类纂》对于这三家选录最多。

钱锺书教训顽劣的长子之后，没过几年出版的著作里就有《《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一书。这个小册子关于读这部古文选集的“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的三种读法，特别值得参考。然而子泉先生平生在国学教育中标榜《古文辞类纂》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完全服膺桐城派。从上文所述钱锺书的文章习作里掺入骈偶句式，反而得到父亲表扬，就可以见其立场了。他同时也并不特别赞许阳湖派。《潜庐自传》里说自己所撰书房楹联，写的就是：

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

文在桐城八湖之外，别辟一途。

这正如《容安馆札记》第七八七则所说的，“文无时古，亦无奇偶，唯其用之宜、言之当”，就足够了，又何必在意是不是“时文”，守不守“家法”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上联里所包含的那种读书上的通达态度，这是不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锺书呢。

刘 铮

西瞥记

一面放置到身后的镜子

学者的形象，多数是由其成名后的著作以及弟子们的追忆筑造的。这样一来，生命的后半期势必压过生命的前半期，成为画面的中心，成为旋律的主调。尤其是学院派的学者，最后在人们心中往往留下一个凛然长者的样子。

我平素搜集学者旧藏外文书，尤其注意他们年轻时读的书。前路未定，他们有的只是对知识单纯的热情。那时读的书，常常与后来择定的学术方向无关，但正因为如此，倒好像一面放置到身后的镜子，把一般人不会留心的侧面映照出来，让他们变得立体了。

今年2月得到一本英文书，极常见的韦尔斯《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在封底前的空白页写着“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廿二日购于金陵 熙仲志”。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学讲疏》虽然读不大懂，翻总翻过一下的。印象中老先生写的文章著作皆属旧学。找来《段熙仲自述》（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一文细读，才发现他年轻时也有亲近西学的一段：“十九岁至武昌入中华大学预科……此后曾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从无锡胡敦复与宪生两先生学英语文，至今未忘 Ruskin 的《胡麻与百合》的城市工业与文化的盛衰升降的关系。一九二三年春来南京入金陵大学文科，从美人汉穆敦博士治心理学与哲学。”段熙仲先生在英文书写下识语时，还在金陵大学读书，下半年即转去东南大学，此后，

叶 扬

名著与画

西达尔与英国民谣《斯潘思爵士》

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的最初几年，住在邻近法学院的研究生宿舍“蔡尔德楼”。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 1825–1896）是哈佛大学的首任英国文学教授。他在英国珀西主教于1765年编成的《古英诗钩沉》的基础上，旁搜远绍，编辑出版了《英格兰与苏格兰流行民谣集》（俗称“蔡尔德民谣集”），以此知名于世。此集最早于1860年以八卷本的形式出版，每首民谣只收录了一种版本，不过这个本子后来已经被在他去世后陆续问世的新五卷本所取代，因为后者经过他精心编辑，每一首民谣都收录了各种不同版本，再加上相关的学术研究札记，成为一部长达两千五百页的皇皇巨著。《帕特里克·斯潘思爵士》就是集中流传颇广的一首，为日后许多著名英诗选集所收入。这类民谣，大致相当于我们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和北朝民歌《木兰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

“蔡尔德民谣集”里收录了此诗的十八种不同版本。今年刚同样的权威英美诗歌选本《诺顿诗集》第六版所收录者，由十一个四行诗节构成，每节之中，双行押尾韵。相传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女儿玛格丽特，于1281年夏天嫁给挪威国王埃里克二世，成为挪威王后，但是送她去挪威卑尔根成亲的许多王亲国戚，在回程中因沉船而全部遇难。此诗讲的是一个苏格兰贵族奉王命出海而遇难的故事，但在内容上不求与历史的细节吻合，这位斯潘思爵士，史上亦无记载，应为杜撰。前三节描写国王在城里饮酒，说起需要一位优秀的水手，为他完成航海的使命，座右一位年长的骑士，推荐了斯潘思爵士，国王于是写了封信，让人传送给爵士。由第四节至第七节，场景转到海边，爵士正在沙滩散步，接信后先是大笑，随后泪流满面，说此时实非出海的安全季节。接下来爵士与他的部下有段对话，爵士不顾风险，坚持出海，而部下则认为天时不正，此行凶险。第



八节急转直下，场景移至外海，爵士一行已在海上遇难，只见他们的帽子在海面飘浮。九、十两节场景又转回海边，贵妇或坐或立，望穿秋水，却再也见不到爵士和亲人归来。最后一节再度将场景转至外海，爵士一行人已长眠在五十英寻深（约九十一米）的海底。此诗使用苏格兰方言，文字简洁生动，疏密得法，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交替运用，场景不断变换，下半篇有如电影里的“交叉剪辑”，民歌的意味极为浓厚。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曾说这是他最为钟爱的英国叙事诗。

在德弗雷尔的《第十二夜》、米莱的《奥菲莉亚》和罗塞蒂的《贝雅特丽齐》这三幅名画中担任模特的，是后来嫁给罗塞蒂的西达尔（Elizabeth Eleanor Siddal, 1829–1862）。她一边当模特，一边也向画家讨教作画的技巧，后来专门接受罗塞蒂的指导。她颇有才情，素描、水彩、油画都能画几笔，还会写诗，可惜三十三岁就英年早逝。这幅画在纸上的水彩就出自她的手笔。原画高241厘米，宽229厘米，由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西达尔从那首民谣里所挑选的，正是第九、十两节里母女妻儿等待亲人、久盼不归的悲惨情节。画面右下角有她姓名的字母缩写和创作年份（1856）。

陆 蓓 容

望野眼

清凉

江南伏日如蒸笼，疾风暴雨皆在须臾，得不到多少清凉。某天深夜，街灯几乎灭尽，月光浸满阳台。眺望之，则见银辉朗照群山，当时捕捉到一丝静悦。及至开窗，热风兜头灌进室内，把这点可笑的清怀荡了个无影无踪。

人间如沸如羹，始知北窗高卧确是良方。奈何人体是一架精密仪器，“不接地气”，也要生病。终于找个下午，要到云栖竹径去。其地在江与湖之间，附近散着许多村庄，家家户户都种茶，兼营农家乐生意，四季都辛苦，也富足。当日静稳无风，食客们开来无数车，道路上热气蒸腾。日头呆坐在云端，照得下界一片昏蒙。茶叶叶子本来油亮，此时成为反射镜，将光线抛回空中。于是天空更白，山影更沉，人心更惶然。

云栖是寂寞的景点，山深树老，天竺山中僧徒岁时前来为莲池大师扫墓，但这里几乎没有游人，很宜于看花、乘凉、听鸟鸣。经验分明如此，不料也被暑日打乱。停车场在竹林阴翳下，一位阿叔负责看管。见我们来，连连示

意：快，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位置。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往里走。越向山中，孩子越多。儿童不畏热，在竹林小路上来回奔跑，衣服贴住小身体，头发黏在脑壳上，犹自精力十足，喊声荡彻山谷。及见前方有万亩方塘，更各自喜悦不胜。有人带了长竿水枪，可惜年幼手短，无法亲自汲水。她被端端正正放在池边，一位青年男子甘心温席，为她持枪、上膛、发射子弹。顿时涟漪满池，搅乱碧琅环影。又有更小的女孩来，摇摇晃晃，也想分得凉思。家长不得不架着她来到最安全的区域。极为谨慎地蹲下，教她慢慢伸手，浸入清波。一下，两下，可以了！迅速拎走，免出事故。

水声与笑声连片，慈和天真都有了，清凉却向何处寻？只能再向深山去。不百步而见一亭，空空荡荡，四围树影，两壁方窗。又不百步，绿苔成片。阳光只余一隙，随枝叶婆娑上下摇动。两只蚂蚁长腿轻颤，匆匆爬过这大片草地，隐没在石头缝中。

《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



6月20日 阴。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成就的全景式展示，也是对中国新文学史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释。近年对之研究的成果已很多，还有没有新史料可以发掘呢？

1935年3月《良友图画杂志》第103期以三个整版的空前规模刊出《大系》出版预告。第一版以“中国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纪念碑”为总题，刊出《大系》编辑缘起（赵家璧作）、《总序》“节录”（蔡元培作）、编者胡适和郑振铎的《编选感想》手迹及释文，还有林语堂、冰心、叶圣陶、傅东华等“名流学者”的“评论摘录”。第二版刊出另八位编者，即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和阿英的《编选感想》手迹及释文。第三版刊出全套《大系》书影及各种“预约”具体办法。正是在这一版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预约样本》预告，一直未引起注意，照录如下：

二十三开四十册，内有编选人亲笔感想、最近玉照、美术剪影、名流题辞、本书样张、预约章程等一厚册。

从这段介绍看，第一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内容丰富。遗憾的是，正因为它是预约广告册，很可能未能保存下来，正如赵家璧后来所回忆的：“这个样本我自己没有留存，遍找各地图书馆都未如愿，因为这种广告之类的宣传品图书馆和个人都不会长久保存的。”（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984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编辑记忆》）

值得庆幸的是，另一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保存下来了。《大系》1935年5月出版第一种《小说一集》，次年2月出版第十种《史料·索引》后出齐。1936年3月全套《大系》再版，同年5

月出版普及本第三版。保存下来的第二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正是为第三版普及本而编印，封面上就印有“三版本出书”五个大字。第二种《样本》内容比第一种还丰富。全书52页，不仅有十位“特聘国内一流名作家”编者的玉照或剪影，还有《舆论界之好评摘录》，共选刊了《文学》《申报》《大公报》《中国日报》《大美晚报》等八种京津沪报刊的评论；不仅有《大系》之总序和编辑缘起，还对每册《大系》作了简要评介。且录《小说二集》的评价：

《小说二集》的编选人鲁迅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写创作小说的人，他的《狂人日记》在民国七年的《新青年》上出现时，既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这部集子选北平新潮社的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等，上海弥草社的胡山源、赵景深等，上海浅草社的高世华、莎子、陈翔鹤等，北京沉钟社的冯文炳、冯元君等，《晨报副刊》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现代评论社的凌叔华，莽原社的向培良、尚钺、朋友，未名社的魏金枝、李霁野、台静农等共计三十三家，五十八篇。鲁迅先生的导言，就叙述上述的每一个团体结合的经过和他们的特色，更批评每一个团体中几个重要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思想。

由于赵家璧已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透露“我又编了一本《大系三版本样本》”，笔者有理由认为这十篇对《大系》的简要评介很可能都出自赵家璧手笔，这是我们可以前所不知道的。第二种《样本》的最后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目录》，编者也即赵家璧处处为读者着想，由此也可见一斑。

笔 会

周末茶座



顾 铮

非专业眼光

日本作家镜头里的1960年上海

日本小说家、记者开高健（1930–1989）在1958年获得芥川龙之介奖，成为该奖历史上年纪最轻的获奖者。1964年，开高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记者赴战火中的南越采访。在跟随南越政府军的采访中，他所在部队遭越南南方解放战士的包围。一场激战后，200人中逃出者仅14人，他是此14人之一。开高后来还冒险采访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因为其杰出的采访报道，他在1981年获颁菊池宽奖。

这里介绍的照片是开高于1960年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时所摄。他是当时代表团中年纪第二轻的作家。大江健三郎比他年纪更轻。开高站在南京东路上向西看去，将行人、人力三轮车（旧称黄包车）、自行车以及有轨电车一起拍入画面，使得特定时空中的移动方式的多样性尽获呈现，也体现了他作为记者观察事物的敏锐。